

皮凯蒂再论 阶级分化的欧洲

编译/邱迪玉

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最近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专栏中写道,虽然知识分子以及富裕的精英人士都支持欧盟当下一体化的形态,然而低收入阶层却持反对态度。这一分化现象对欧盟虽不致命,但危害仍然深远。回想过去25年来举行的所有有关欧盟的全民公投,工人阶级已经持续、系统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欧盟建设的不满,相反富裕的上层阶级一直对欧洲一体化持支持态度。

皮凯蒂提到,在1992年法国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公投中,低收入、低资产以及低教育水平阶层有60%的人投了反对票,而高收入的精英阶层却有40%的人投了赞成票,然而依靠其绝对人数的优势,最终赞成票以51%惊险过关。同样的分化情况出现在了2005年法国就《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中,只是这一次,有80%的低收入阶层投了反对票,最终导致了55%的多数否决了此项条约。接着在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中,低收入人群中70%的人选择了脱欧,于是英国最终以52%的多数通过脱欧。

我们该如何解释有关欧盟的公投一直持续出现上述这种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毕竟如果综合考察社会分层中的教育水平、收入和资产这三个维度,人们会发现,如今英国和法国的选民结构早已不再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选民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一直逐渐靠向左翼政党,高收入及高资产人群则继续给予右翼政党以有力支持。但在1992年、2005年法国有关欧盟的公投以及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中,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中的知识精英和富裕人群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相反受教育程度低、



欧洲中央银行

低收入和低资产阶层,无论其政党倾向,都反对欧洲一体化。

皮凯蒂说道,上层阶级对此现象有一种解释,他们称工人阶级都是民族主义或者排外主义者。可是他们忽略了工人阶级的排外可不比精英阶层更明显自然。其实有个更简单的解释,过去几十年来欧盟的发展进程是基于不同国家间的普遍竞争,客观而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



托马斯·皮凯蒂

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经济体参与者,即上层阶级受惠最多。所以,除非欧盟采取强力措施来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例如对富人采取更高税收以减低穷人的税收,否则这种现象还会持续。

皮凯蒂认为,这种社会分化的现象其实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我们有必要从历史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早在1938年的英国,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们发起过一个名为“联邦联合会”(Federal Union)的运动,旨在建立一个欧洲联邦,这一倡议迅速地得到学界的领军人物,如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和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响应。随后,在此基础上,丘吉尔在战时的1940年6月向法国提出成立“法英同盟”(Franco-British federal union)的建议,但是遭到了当时正在波尔多避难的法国政府的拒绝,他们情愿将所有权力都交给贝当将军。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的4月还曾有一批英法学者在巴黎就此计划召开过研讨会,提出首先在英法之间设立同盟,然后扩大到整个欧洲层面,但最终并没有达成共识。

经济学家哈耶克用自由主义思想阐释了他的欧洲联盟构想,哈耶克范式下的欧洲会是一个基于市场竞争、自由贸易以及稳定货币体系的贸易联盟。罗宾斯的想法与哈耶克相

似,尽管他还提出了设立欧洲预算,特别提出了征收欧洲遗产税的方案,以防自由贸易以及人口自由流动都不足以促进繁荣,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其他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则是更接近民主社会主义,例如贝弗里奇,他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拥护者,以及社会学家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她提议设立欧洲收入和遗产税,将税率提升至60%,并且设置收入以及遗产继承额的最高值。

皮凯蒂说,1940年4月举行的会议虽然并没有就成立欧洲联盟的社会与经济议题达成共识,然而因此引发的争论受到了整个欧洲的关注。例如来自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斗士阿尔蒂耶·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当时他正被囚禁在文托泰内岛的监狱中,在狱中他写下了《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呼吁建立一个自由团结的欧洲联邦以对抗将欧洲带入惨烈战争的民族主义。

皮凯蒂最后说道,虽然如今的欧洲并不需要是哈耶克式的,现今的欧洲也更多是在服务着能够获益的阶层,以更好地实施他们的阶级政策。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80年前就有像伍顿、贝弗里奇甚至罗宾斯等学者视野下的欧洲联盟愿景,欧盟的发展是否可以走向另一个方向?

(综合编译自 David Fernbach 英译皮凯蒂刊登在《世界报》上的文章“Europe and the class divide”, versobooks.com 等)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乡土经济是一种农工混合的经济

本报记者 刘迪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大的讨论:我们的国土为何呈现出如此的破败?人们四处去找答案,有人把目光投向了乡村的衰败。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整个乡村结构的破坏是导致乡村危机的根源。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的经邦论道系列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表示,上世纪30年代,乡村结构破坏只是个开始,城乡之间有机循环的割裂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

农耕文明之下的中国乡

村平静地走过了几千年。在没有外力强行进入的情况下,其内部结构保持超稳定的状态。刘守英认为,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并非纯粹为农业支撑,而是通过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方式,维持着生产者家庭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农民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靠家庭手工业增加家庭收入,以农业为生,还兼具工匠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在乡村里,农民与木匠、铁匠、屠户、裁缝、酱油铺老板的身份丝毫不存在矛盾。也就是说,农户在中国乡村,不仅仅是家庭农

业的经营单位,完全可能同时是手工业生产单位。农民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的乡土经济是一种农工混合的经济。以家庭手工业、作坊为表现的乡村工业与农业形成有机结合,支撑着农村家庭经济。这种有机配合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极其复杂性。

复杂的结构往往兼顾稳定性。刘守英认为,中国乡村的超稳定结构首先表现为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农民是粘在土地上,向土地讨生活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其次,乡绅在乡村治理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保持着乡村的高度自治,并世代相承。再次,历史上,中国的城乡是互通的,“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价值观始终维系着“离土”之人与乡土之间的联系。城市资本是要下乡的,乡里人有钱也会在城里购置产业。中国乡村并非简单地依靠乡土要素在生存。

费孝通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机械大工业产品进到乡村,“洋烟”“洋火”“洋盐”“洋糖”“洋布”这些“洋”物件打破了原先乡村农工、农户互补的结构,挤压了乡土工业的生存空间。乡间只剩下原本负

责生计的农业,于是,农民走向了贫困。由此,两种要素陆续离开了乡村。首先是乡村的年轻人外出进城,在城里接受了现代教育,从此再也不会回去了;其次是资本撤离乡村。当农民走向贫困之后,抗租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是,那些原来选择“下乡”的城市资本陆续“返城”。

此后,乡绅也跑去了城里,终结了中国乡村几千年的乡绅治理。

最终,城乡的有机循环被割裂了,平静而古老的中国乡村走向了沉默。